

世界與西方

湯恩比 著
果仁 譯



牧童文庫 19

在近四百年來，世界與西方的關係已日益密切。世界與西方的關係如何建立？簡言之，係由西方槍砲所建立。在這不正常的關係中，西方扮演著主體角色，西方之外的各個世界則扮演接受挑戰的角色。在這過程中，俄國、土耳其、日本、中國等，都在西方的挑戰下激起各不相同的回應。這些回應的成功度亦因各國國情的不同而有差異。其差異何在？這是我們這些非西方人所最關切的主題。回應後，世界給西三衝擊甚至造成擊甚至造成甚至造成了

西方人士焦慮不安的沒落感。那麼，這些衝擊的動力來自何方？這也是我們所當注意的課題。

具有世界胸懷的英哲湯恩比，運用他擅長的「挑戰與回應」的歷史解釋模式，詳細地解說了西方對世界的挑戰與世界對西方的回應形式，進而討論廿世紀世界對西方的衝擊。透過湯恩比的解釋，世界與西方簡明的整體圖像將浮現在我們的眼前。



世界與西方

湯 恩 比 著
果 仁 譯

牧童文庫 19
牧童出版社

THE WORLD AND THE WEST

BY ARNOLD J. TOYNBEE

TRANSLATED BY KOU JEN

COPYRIGHT © 1976

COWBOY PUBLISHING CO., LTD.

TAIWAN

R. O. C.

世界與西方

牧童文庫 19

著者：	湯恩比
譯者：	果仁
出版者：	牧童出版社
	臺北市溫州街107巷5號
	郵政劃撥臺北第18705號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0677號
發行人：	姜紫燕
	臺北市溫州街107巷5號
每冊定價：	新臺幣 25 元
初版：	中華民國65年3月20日

P1000376

S1000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目錄

關於湯恩比	一
俄羅斯與西方	五
伊士蘭與西方	二一
印度與西方	三五
遠東與西方	四八
世界與希臘人及羅馬人	五九
文化遭遇的心理研究	七三
當前美國的危機與困境	八九
湯恩比論歐洲與世界前途	一〇三

關於湯恩比

羅素死了以後，湯恩比已是英國目前唯一能具有世界性聲譽的思想家。如果當前美國學術研究的風氣，有一天成爲國際間的標準，那末，像湯恩比這樣以全人類的文化作爲研究對象的歷史學家，可能不會再有了。依美國的標準，他的「歷史研究」，自然是非科學的，但無人能否認它是一部對人類文明充滿豐富想像的解釋、充滿歷史性智慧的傑作，而這些似乎正是美國學術市場裏培養不出來的東西。在未來的十年中，歐洲的商業市場，很可能被美國的標準所取代，但歐洲學術傳統裏所培養的大腦和智慧，是否也將被美國的標準所取代，我們頗表懷疑。

湯恩比一八八九年出生於倫敦，曾在牛津大學的巴里奧學院 (Balliol college) 接受教育，四十年前就會到過中國，並寫了「中國旅行記」(A Journey to China 1931)一書，在將近八十歲的高齡時，才在英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及倫敦大學國際史學研究教授的職務上退休。一九三五年「歷史研究」的前三部問世以來，曾遭遇國際史學界嚴厲的批評，多數懷疑他對世界文明研究所得的結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的文明觀，逐漸受到廣泛的注意，同時也使他享有國際性的盛名。由桑馬威爾根據「歷史研究」前六節編而成的「歷史

研究簡編」，早已是世界性的暢銷書之一，四十六年簡編在臺灣就已經有中譯本。

人類的歷史，是不是也能像自然科學一樣，找出它的普遍法則呢？這是自十八世紀以來歷史家們在科學發達的刺激下早就存在的一個大問題。一九五五年，湯恩比在接受賴特（C. Wright）的訪問談話中，曾對這個問題有過簡要的說明：

賴特問：我了解在任何歷史學家的歷史分析中，都免不了有個人的因素存在，但其中必也有一種客觀的科學因素——某些類型的發現？

湯氏答：這正是今天人們爭論最激烈的一點，這是你知道的。我想我們所謂「科學」，意思是指規則和一致的發現與理解，即科學家們所謂的「法則」。有些歷史家不承認在人類事務中有這種規則和一致，他們說歷史並不重演，但我對這一點却持異見，我相信歷史的確有一部分是在重現，我相信你在過去的史實中能發現某些一致。不過，我並不是一個宿命論者，我不相信我們人類沒有自由意志，我不相信過去的類型能預言或預定將來的命運。我想有自由的因素，也有類型的因素，在我們預示將來時，對這兩種因素都必須加以考慮。

由於湯恩比相信歷史的演進，有自由的因素，因此，當前人類文明雖面臨新的挑戰，雖遭遇到新的危機，但只要我們自己願意，我們仍有相當大的自由來決定自己的命運。人類文

明並沒有不可逃脫的必然悲劇。

對中國的讀者而言，最感興趣的也許是湯恩比對中國歷史或文明的解釋。湯氏把中國的文明分爲「漢族文明」和「遠東文明」。「漢族文明」發源於黃河流域，在這裏他應用「挑戰與反應」說做解釋，認爲黃河流域惡劣的自然環境挑戰了古代的漢民族，「漢族文明」就是在這種挑戰下發展起來的。「遠東文明」則是由於「漢族文明」吸收了來自印度的佛教而產生的「分化體」。這個分化的文明，經過魏晉南北朝的吸收和合併的階段，到唐代於是達於鼎盛。照湯恩比的看法，唐代天寶之亂以後，「遠東文明」便開始衰落了。「遠東文明」衰落以後，形成兩次政治上的大一統局面，一次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一次是滿州人建立的清朝，而元清之間的明朝，湯氏認爲並沒有建立真正的大一統。湯氏又認爲「遠東文明」雖衰落，但並沒有完全毀滅，只是發展中斷了。這個發展中斷了的文明，它將來的前途如何呢？這大概是中國知識份子最關切的問題了。依湯恩比，中國文明的將來可能是：

第一、在西方文明的挑戰下，回生乏術，逐漸被西方文明所同化。

第二、在西方文明的長期衝擊下，重新恢復信心，並創造一種新的文明。

縱然湯恩比對中國的歷史或文明的解釋全錯了，但他的「不創造，便是毀滅」的啓示，對中國人來說，是極爲珍貴的。

附：湯恩比著作表

- ① 歷史研究，共十冊（一九三五——一九五四）
- ② 民族與戰爭（一九一五）
- ③ 新歐洲（一九一五）
- ④ 希臘與土耳其的西方問題（一九二二）
- ⑤ 希臘文明及其特徵（一九二四）
- ⑥ 巴黎和會以後的世界（一九二五）
- ⑦ 土耳其（一九二六，此書與K. P. Kirkwood合著）
- ⑧ 中國旅行記（一九三一）
- ⑨ 基督教與文明（一九四〇）
- ⑩ 文明的考驗（一九四八）
- ⑪ 世界和西方（一九五三）
- ⑫ 歷史學者對宗教的見解（一九五六）
- ⑬ 從東方到西方：世界旅行記（一九五八）

俄羅斯與西方

當一九五一年春，英哲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氏「歷史的研究」一書之最後四卷甫行脫稿之時，「大英廣播公司」曾詢請湯氏將其甫行脫稿之四卷大作作一概述，在該公司播出。逮湯氏以爲，其「歷史的研究」一書之前六卷早已由美國索謨威爾教授(Professor Somevell)節爲一簡明之讀本，並極精彩，而此最後四卷，索氏亦將於適當時間節出，用饗讀者。因此，湯氏乃認爲，與其對該書四卷作一廣播式之概述，倒不如播一與當前世界局勢發展更密切之論題，「世界與西方」一書即湯氏在這一構想下出現者。當湯氏在「大英廣播公司」播講時，曾引起廣大聽衆之深刻的興趣。稍後由牛津大學出版部輯成單行本問世，銷行至廣。

本書的名字是「世界與西方」，而第一章則是「俄國與西方」。

爲了使讀者們對於本書的主題有適當的認識，最好的方法，也許就是先把本書的題名解釋一下。讀者們也許要問：這本書爲什麼叫「世界與西方」？難不成所謂「西方」也者，不就是等於今天實際事務上，全世界最重要的部份嗎？縱使作者以爲他應該提到除開西方以外的其餘世界地區，那末，爲什麼要把「世界」字樣放「西方」前面，而不叫做「西方與世界」？

俄羅斯與西方

「，反而叫做『世界與西方』？縱使西方不即等於全世界，作者至少也應該把西方放在第一位，放在前面。

對了，作者這本書的取名，是經過一番深思工夫，而不是隨便題上的。它的作用，是在於提出兩個論點；這兩個論點對於了解本書的主題，是相當重要的。

原來所謂「西方」也者，縱使在西方國家的權力於最頂點的時候，它也並不是近代史舞臺上唯一的角色（而且這個頂點，現在也許已經過去了）。這是第一點。第二個論點是，在世界和西方遭遇的已經四五百年的過程中，直到現在為止，得到許多有意義經驗的，與其說是西方這一面，還不如說世界那一面。西方並未受到世界的打擊，而是世界受到西方的打擊——並且打擊得很重。因此之故，本書的題名，就把世界放在前面的第一位。

一個西方人，如要對這種主題加以了解，那末，他就至少要嘗試離開自己的西方人地位幾分鐘，以人類之中非西方的大多數觀點，來對世界與西方之間的遭遇，作一度衡量。因為儘管俄國人，回教徒們、印度人、中國人、日本人，以及其他世界上非西方的人士們，在種族上、言語上、文明上、宗教上，都是彼此互相不同的，但如果有個西方人問這些人們對於西方懷抱什麼意見的話，那末，他所得到的回答，可能都是一樣的。他們將告訴這位西方人，近代最大的侵略者就是西方，而且他們之中每個人都各有一些受西方侵略者蹂躪的經驗。

俄羅斯人將提醒他，他們的國家，曾經在一九四一年，一九一五年，一八二二年，一七〇九年，以及一六一〇年，受到西方軍隊由陸上打進來的侵犯。而非洲與亞洲的人士們，將提醒他，自從十五世紀以來，西方的傳教士，商人，以及兵士，就不斷跨海而來，由海岸衝進他們的國家。而亞洲人更要同時提醒西方人，在上述這個時期內，所有在美洲、澳洲、紐西蘭、南非，以及東非的許多世界上最後剩下的大片空地，其中大部份都被西方人所佔有了。非洲人呢，也要同時提醒西方人，他們曾經被奴役，被運到國外，橫過大西洋，去充當歐洲殖民主義者在美洲的活工具，以滿足他們西方主人翁的貪婪。至於那些原來居於北美洲土著民族的後裔們，就更要提醒他，他們的祖先曾經被趕開，以便讓路給西歐的闖入者及其所帶來的非洲奴隸。

這一類的控訴，將要使今天大多數的西方人士，爲之吃驚、震動、難受，或甚至於憤怒。因爲西方人裏的荷蘭人，總是記住他們已經撤離了印尼，英國人總是記住他們自一九四五年以來，已經撤離了印度、巴基斯坦、緬甸，以及錫蘭。從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的南非戰爭之後，英國人的良心就再也沒有受其他的戰爭譴責了。美國人除了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之外，他的良心上也沒有任何其他的不安。不過，作爲一個西方人來說，我們太容易忘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大戰中，一再攻擊它那些包含俄國在內的許多鄰邦國家的德國

，也還是西方人呀。而且我們又容易忘記，俄國人、亞洲人，以及非洲人，他們是很難把這些屬於「法蘭克人」的許多的不同的集團，一一加以細分的。所謂「法蘭克人」也者，就是世界上對於西方人最籠統的稱呼了。拉丁文裏有一句著名的諺語：「當世界作出判斷時，那個判斷也就是天經地義的結論」。那末，在過去四個半世紀之中，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為止，世界人士們對於西方的判詞，在那漫長的時期中，不是也可以得到確論嗎。

在那一時期中，大體上，以世界的經驗來說，西方確是侵略者。所以，如果說今天形勢已經完全倒轉，蘇聯及中共已成爲對西方的侵略者的話，那末，那也不過是一部全篇故事的一個新章節而已，而且它的開始還是二次大戰以後的事。因此，今天西方對於近來俄國及中共侵略行動之驚訝與憤怒，就足以充分表明，對於西方來說，受別人侵略還是一種新的經驗；可是這種被侵略的滋味，世界却有好多世紀以來，都從西方的行動裏嚐受過了。

然則，世界所受西方侵略的經驗，爲如何呢？

這裏可以先由俄國的經驗開始，因爲它是非西方的世界大部份的一個構成份子。俄國人曾經是基督教徒，而且大多數俄國人，現在也還是基督教徒，但他們却從來不是西方式的基督教徒。俄國人並非像英國人那樣，從羅馬的統治下被變爲基督教徒，而却是從君士坦丁堡的統治下，被變爲基督教徒。自然，東方基督教領域與西方基督教領域的發源，是共同的；但

它們彼此之間，却完全陌生，而且時常彼此敵對的。這種情形，也就宛似今天俄國和西方之間的不幸情形。所以，俄國與西方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很可以稱之爲它們各自歷史的「後基督教」時代。

俄國與西方之間大體上不很愉快的關係，在其初期，却也有着一個較爲愉快的一段。那時，雖然俄國人與西方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但在中世紀的初期，它們彼此相處得還算很好。人民彼此之間有商業來往，皇室彼此之間也互相通婚。彼此之間的互相疏遠，開始於十三世紀，彼時俄國已在韃靼人的統治之下。

韃靼人對於俄國的統治，是暫時的，因爲它是一個遊牧民族，來自大草原地帶，它不習慣於俄國的田野和森林。因此，經過韃靼人這次統治之後，俄國人不可補償的損失，並非源於它的韃靼征服者，反而是源於它的西邊隣居。因爲它的西邊隣居們，利用了俄國被征服後的軟弱不振狀態，紛紛企圖削去而且吞併俄羅斯世界中的西邊邊疆，這些地方就在俄國的白俄羅斯境內，以及烏克蘭的西半部。這些在十三世紀與十四世紀中被西邊隣國奪自俄國的大片領土，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方又被俄國奪了回去。

這些中世紀裏發生的，西方國家征服俄國領土的事件，不獨對於俄國國內生活方式，發生一個重大的影響。而且對於它和後來西方國家的關係，也發生一個重大的影響。西方國家

之對俄國不斷壓力，不僅僅使它和西方國家之間疏遠起來，而且也使俄國人受到一個事實教訓，使它不得不對一個國內的俄國權力屈服。這個權力就是莫斯科大公在莫斯科所建立的。那時候，莫斯科權力把一個專制的政體在俄國強制建立起來，因為它如沒有這樣的專制，就不會有政治的統一，因此也就無法生存下去。

俄羅斯建立的專制及中央集權政府之所以出現在莫斯科，也並非一件偶然的事。因為當時對於所剩留下的俄國領土來說，如果有一個西方侵略者打進來，那末，莫斯科實在是首當其衝。比如，一六一〇年波蘭人的入侵，一八一二年法國人的入侵，以及一九四一年德國人的入侵，就都是通過莫斯科這條路的。

自十四世紀初年以來，俄國歷任政府的基本性質，都是專制的，中央集權的。莫斯科式的俄國人政治傳統，不獨對於它的隣國來說，是可驚的，是難以接受的，甚至對俄國人自己來說，恐怕也並非什麼愉快的事。但所不幸的是，俄國人居然已習慣了可以加以忍受。這一部份原因，是由於習慣成自然；但又有一部份原因，則是因為他們感覺到，比起另一種受西方侵略的隣國征服可能來，這種國內專制的痛苦，畢竟還是較輕微的一種邪惡。

俄國人之易於向一個專制政體低頭，已經成為它一個傳統。這在西方人看起來，就是今天西方與俄國之間調整關係的難關之一。西方人之中，大多數都把暴政當為萬難容忍的社會

邪惡之一。我們西方人曾經不惜可怕的代價，平息了許多出現在西方世界本身的許多暴政，當它以法西斯主義或以國社主義出現在義、德兩國的時候。因此，西方人對於俄國一切形式的暴政，都感厭恨與不信任，不管它是沙皇政治，或是共產主義。

西方人不願見到這種俄國式的暴政向別處擴張。西方人士現在特別對於俄國暴政所給予西方自由觀念的危機，表示關心，因為西方人自從一六八二—一八三年土耳其人對於維也納的第二度圍困以來，歷史上，就從未採取過今天這樣的守勢。西方人目前的守勢，是數百年來的首次。

西方人相信，他們現在對於俄國二次大戰後所給予西方的威脅，非常擔心，是很有理由的。可是同時，西方人必須當心，也萬不可讓自一九四五年以來，俄國與西方之間位置的倒轉，就誤引導大家只注意俄國目前對西方的威脅，而忘記了西方國家以前對於俄國的威脅了。大家對於俄國與西方之間的遭遇，如果以歷史家的觀點來看，而不是以新聞記者的觀點來看，那末，大家就可以看出，在過去幾個世紀裏，直到一九四五年為止，俄國人也有着同樣理由，可以對西方敵視，如同今日西方敵視俄國的情形，完全一樣。

過去這些世紀，西方從十三世紀直至一九四五年的對俄國的威脅，從來都沒有中止過。而且自從西方的技術革命爆發以後，使得這個威脅，格外嚴重起來了。西方這種技術革命，

現在幾乎已成爲一種無法停止或改變的事，而且一直到現在，也還沒有表現出減輕或微弱的跡象。

當西方採用槍炮時候，俄國也立刻學樣，而且後來至十六世紀時，它又用這些由西方傳來的槍炮，轉而去征服伏爾加河流域的韃靼人，以及烏拉爾山及西伯利亞的原始民族。但到了一六一〇年時，西方槍械的優勢，又使得波蘭人可以佔領莫斯科，而且一直佔據莫斯科達兩年之久。同時，瑞典人也剝奪了俄國在芬蘭灣頭的，波羅的海上的出路。對於這些西方國家自十七世紀以來的侵略行動，俄國的答覆，就是自己也大規模採取西方的技術，以及採取它那與技術不可分離的西方生活方式。

並且，有一件足以表明莫斯科政權的專制及中央集權的特性的，就是上述這種在十七與十八世紀之交，發生在俄國的技術革命及相伴而來的社會革命，是由於一個天才人物的由上而下的命令，強加於俄國。這個人就是彼得大帝。彼得大帝這個人，在了解世界與西方關係之中，不獨就俄國本身與世界關係而論，是個關鍵人物；即使就世界任何其他地方與西方關係而論，也是一個關鍵人物。因爲彼得大帝可以代表過去兩個半世紀以來，一種西化改革家人物的主要類型。這些人強迫世界訓練自己，用西方的槍械來抵抗西方的侵略，這樣方救了世界，使不至於完全淪於西方的統治之下。因此，土耳其的蘇丹色楞三世，摩漢默德二世，